

統戰、銳實力、還是認知作戰？ 一個分析中共對臺宗教工作混合式 影響力的架構

王 韻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民間交流一直是兩岸關係中發展最快速也最相對穩定的層面，但兩岸長期以來也一直都有提防「和平演變」與拒絕「統戰」之爭，其中兩岸宗教交流所衍生的統戰問題，一直在臺灣社會中有極大的爭議。支持交流者認為這是人民言論與結社自由的權利，而且臺灣蓬勃發展的宗教市場足以彰顯臺灣的「軟實力」去影響中國，而反對者直指這是中國「統戰」、「銳實力」或「認知作戰」的一環，透過臺灣內部特定的宗教團體扮演「中共代理人」，去影響臺灣的輿論、扭曲選舉的結果或反對政府的政策。本文藉由比較三種研究範式中呈現的定義、操作標準與分析上的優缺點，進一步梳理目前宗教交流研究呈現的各項議題成果與不足之處，嘗試為這個重要問題提出有意義的討論方向，並提出「混合式影響力分析」的概念，作為分析威權政權利用不同手段組合與交錯運用影響力輸出工具的新視角，期望作為今後政策辯論的基礎，以及未來研究時的理論參考。

關鍵詞：統一戰線、銳實力、認知作戰、兩岸關係、兩岸宗教交流

壹、前言

2000年，具有近百年歷史的尼姑庵碧雲禪寺正在擴建，禪寺與工程包商魏明仁簽下一紙合約，載明工期兩年、工程款項寺廟前殿七千多萬元，後殿六千多萬元。與許多臺灣大大小小的宗教場所一樣，這個上億元的擴建工程，反映了臺灣蓬勃發展的宗教市場，以及百姓對於信仰的虔敬。但2002年時建商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寺廟的所有權被法拍，最後所有權轉移魏家。建商魏明仁接管這間佛寺的第一個作為，就是驅逐80歲的住持釋懷宗及眾位比丘尼，聲稱自己將會更「好好經營」這間擁有5,000位信徒的寺廟。¹

這件糾紛十多年間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直到2016年因為魏明仁將該寺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民族思想愛國基地」，號召民眾參加2017年元旦五星旗升旗典禮而聲名大噪。魏對記者表示，2016年之後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大壞，「在臺灣生活非常痛苦，民進黨執政又令他大失所望，盼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解放臺灣」。升旗典禮的當天，約有一百多名臺商、陸配、統促黨員、中國媒體記者出席，眾人手持五星旗，在典禮上齊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²

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此重大新聞事件，竟超過一年沒有引起地方

-
1. 這是引用由住持釋懷宗委託中華佛寺協會秘書長林蓉芝的說法。3,000萬本票是魏明仁一開始就以願借3,000萬元為手段，獲得廟方的信任而取得建案承包權，後來再利用廟方不識法律細節的漏洞，「合法」取得寺廟的產權，完全是詐騙集團的作為。而魏主張這是因為他身為佛教徒，廟方強迫他捐出三成的工程款，但他相當不齒住持釋懷宗擁廟「亂搞」，接管是為了好好「整頓」碧雲禪寺，未來會「好好經營」。〈搶廟產失利 碧雲禪寺住持控建商詐騙〉，《自由時報》，2010年11月11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442837>〉。
 2. 〈彰化升五星旗吸百餘人參加 縣長怒斥：認賊作父〉，《三立新聞網》，2017年1月2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12523>〉。

政府（擴建案本身就是違建）或是中央政府（根據《監督寺廟條例》主管單位為內政部）的任何作為，直到 2018 年 9 月 19 日美國《紐約時報》報導臺灣一間佛寺變成「共產主義神殿」，百年佛像被中共的統戰標語和毛澤東、周恩來的肖像所取代，³彰化縣政府才在同月 21 日突然宣布對這個「五星廟」違建斷水斷電，並於 26 日強制拆除違規增建的廟體。⁴

從一個超過十年的私人產權糾紛變成國際關注的事件，凸顯民間宗教事務的群眾性、跨國性、公私利益交錯等複雜特質：⁵民主國家的執法單位，在面對有宗教背景的爭議時常會投鼠忌器，懼怕惹上「打壓宗教自由」等批評；而當事情真正被國際媒體關注時，卻又急忙草率處理，缺乏具有整體性的考量與回應。同時，「五星廟」事件也顯示，在臺灣民間宗教私人化的特質下，信仰的確會被用來牟取個人利益，進而影響政治與兩岸關係。由於「五星廟」及香港抗議人士在臺遭受騷擾等類似的事件，在 2017 年到 2019 年期間引起廣泛的關注，⁶

3. Amy Qin, “Buddhist Temple, Now a Communist Shrine, Plants China’s Flag in Taiw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9/world/asia/taiwan-china-reunification-buddhism.html>>.

4. 〈「佔廟為匪宣傳」躍「紐時」民代批評彰縣府丟臉丟到國際〉，《自由時報》，2018 年 9 月 20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7653>>。

5. 對此中共統戰部門早有「宗教五性」的結論：群眾性、長期性、國際性、複雜性，在牽涉少數民族時還有民族性。「五性」一詞出現在 1953 年李維漢主持的中央統戰部「關於過去幾年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的報告中。這個報告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得到毛澤東讚許並轉發全黨。〈葉小文：當前我國的宗教問題—關於宗教五性的再探討〉，《人人焦點》，2020 年 12 月 15 日，<<https://ppfocus.com/0/he5e0f3b9.html>>。

6. 例如 2017 年初，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抵達臺灣時，遭到兩百多名統派團體「愛國同心會」成員在機場抗議。黃之鋒在抵達出境大廳時，有數

因此立法委員在 2018 年提出《中共代理人法案》、《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案》等八個版本，在 2019 年 11 月底由行政院統一推出以《反滲透法》為主的簡化版法案，並於同年底三讀通過。但這個僅有 12 條條文的綱要型法案，顯然不可能解決複雜的中共影響力問題，不僅反對黨不支持，獨派人士也多有批評；⁷對臺商、地方組織、村里長、宗教團體，以及大學等常與中國交流的團體之中，產生明顯的負面效果，對於臺灣自豪的自由民主形象反而有所傷害。⁸

民間交流一直是兩岸關係中發展最快速也最相對穩定的層面，尤其在 2016 年兩岸政治關係惡化之後，民間交流的維繫更是難能可貴，一方面是兩岸政府保持非正式「二軌」對話的平臺；另一方面民間的善意與互動可以減緩民族主義激情的不斷推升，可以說是維繫臺

名黑衣男子突然衝上前試圖揮拳毆打。2019 年 9 月，香港歌手何韻詩參與臺灣團體聲援香港示威運動時，被一名「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胡志偉潑漆。2019 年，被中共非法關押的五名香港銅鑼灣書店成員之一的林榮基，擔憂自己在修例後「送中」因而逃往臺灣。他在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臺北重開銅鑼灣書店，遭受多次騷擾與潑漆攻擊。〈林榮基台灣重開銅鑼灣書店遭遇的坎坷〉，《BBC 中文網》，2020 年 4 月 29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460639>>。

7. 〈反滲透法對撞民意！反對聲浪從藍橘白蔓延到深綠獨派〉，《中時新聞網》，2019 年 12 月 29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229000472-260118?chdtv>>；〈怕查水表 金門老街五星旗連夜拔除〉，《中時新聞網》，2020 年 1 月 2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102000452-260118?chdtv>>。

8. 支持《反滲透法》的人可能認為「我沒有犯法，為何要擔心？」，但根據作者私下參與兩岸交流團體的反應，許多人正是抱持不願意犯法的良民心態，覺得如果政府不支持兩岸交流，那他們大可不必去淌這個混水，但這顯然對於兩岸良性交流是有害的，如果正正當當從事兩岸交流的人都漸漸退出，最後將只剩下逐利而生的兩岸掮客而已，可能產生「劣幣驅除良幣」的反面效果。

海和平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因為兩岸體制的不同，中共可以無限制地壓制臺灣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力，然而臺灣政府卻無法對中國影響力有類似的規範力，這也讓兩岸民間交流中所衍生的政治問題，一直在臺灣社會中有極大的爭議，反對者直指這些是中國「統戰」、「銳實力」或「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的一環，尤其他們認定臺灣內部特定的一些宗教團體就是「中共代理人」，指控他們在為北京政權影響臺灣的輿論、選舉或政府的兩岸政策。

法律上的問題暫且不論，研究者究竟應該用哪一種分析工具去處理民間交流中無所不在的中共影響力？這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問題，更關係到是否能正確地理解這些現象，做出有效的學術研究與政策建議。因此排除研究兩岸民間交流中比較不具爭議性的軟實力展示、溝通增進與善意表達等部分，本文想要聚焦在針對負面影響力的學術研究，也就是「統戰」、「銳實力」及「認知作戰」三種常見的影響力型態，提出以下問題：

第一，要如何定義中共境外影響力作為？中共的影響力作為繁多，究竟哪一些行為是統戰、哪一些是銳實力、哪一些是認知作戰？對研究者來說，這牽涉到如何定義統戰、銳實力與認知作戰的問題，也牽涉到如何歸類與蒐集各種領域的案例資料，中共對民間交流的滲透到底應該歸類為統戰議題（比較政治學、中國研究、中共黨史等文獻關心的範疇）、威權擴散議題（國際關係學中銳實力文獻關心的焦點），還是非傳統國家安全議題（認知作戰研究主要關心的範圍）？對政策制定者來說，防禦對手的各式影響力工程 (influence operations) 是理所當然，但統戰、銳實力或認知作戰，哪一個分析工具最能夠抓住類似「五星廟」這樣同時具有跨國、跨領域、非傳統安全特性的現象呢？

沒有清楚了解對手實際的目的，就很難有清楚的定義及決定有效的分析工具。這些問題牽涉到操作指標設定的合理性，以及效能評估的困難。因此本文第一個目標是要透過梳理文獻，從其中大量中共影

響力工程的案例，整理出第一線研究者所使用的定義、主要操作的指標、優點及可能的盲點。這些整理有助於後來的研究者分類真正需要被關注的案例，以及聚焦具有實際影響力的面向，也才能產生真正有效的分析。

第二，各式各樣的中共影響力工程，到底成效如何？是「敵人就在你身邊」，還是效果可能被過度放大了？據此，什麼樣的政策回應又是最恰當呢？本文的第二個目標，是把這些工具與概念用在分析目前媒體中討論度最高、普遍認為被滲透程度最高的兩岸宗教交流，試圖發掘這些工具在理解中共滲透宗教交流時的優點與盲點，以及綜合主要案例研究所提供的結論。簡而言之，工具當然各有千秋，統戰、銳實力、認知作戰各有其擅長的議題與因此而生的政策建議，但宗教交流案例幫助我們認清一個目前分析上最大的盲點，就是沒有一個單一途徑可以充分解釋中共影響力工程中，頻繁出現的彼得原理 (Peter Principle) 困境：中南海的青睞與拔擢，為何總是給了那個最不能勝任的人？⁹ 以對臺宗教統戰來看，我們已經從「五星廟」或媽祖聯誼會身上看到這些「代理人」整體成效非常不好，但為何中共仍要繼續支持這些已經等於是象徵中國對外的負面形象，例如「五星廟」魏明仁這樣的「中共代理人」？

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的部分原因，來自相關研究仍缺乏方法論的基礎，隨意選擇支持論點的案例、忽略不支持的案例，而陷入「立場

9. 「彼得原理」一詞指的是因為升遷權力的壟斷，在企業的等級制度中，人們雖因其人格特質或特殊表現不斷地被拔擢，但最終總會升到一個不能勝任的職位，所以組織中總是充滿著不適任的人占據著高位。中共的威權體制與企業的等級制度類似，都缺乏民主決策機制與體制外監督，產生的組織困境自然就極為類似，因而類似「彼得原理」描述之團體成員，反而更受到青睞與拔擢。Laurence J. Peter & Raymond Hull, *The Peter Principle: Why Things Always Go Wrong*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69), pp. 1-179。

決定論」的困境，更容易落入不知何為滲透，或什麼都是滲透的嚴重困境，研究者在臺灣不小心就被批評為「亂帶紅帽子」，或是在西方社會中被歸類為「反華」或「反移民」的極右派分子。這些自我質疑與自我分裂的爭吵，都妨礙對這個真實存在現象的理性分析與有意義的政策討論。

對此，作者支持美國國際安全理論大師、曾任美國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及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的奈伊 (Joseph Samuel Nye Jr.) 的基本主張：民主體制面對威權政府的「不對稱」式滲透威脅，應該不要放棄或扭曲自己的自由開放原則與之對抗，而是要更努力看清楚自己社會的長處與弱點，其中自由開放是長處，不是短處，是民主對比威權力量的來源。問題在於民主國家政府是否能將軟實力 (soft power) 的長處與傳統的軍事外交手段 (硬實力, hard power) 結合在一起。¹⁰

奈伊這個「巧實力」 (smart power) 主張，提醒我們推進分析品質的一個方式，就是要像政策制定者必須打破軍民部門之間的界線一樣，學者也需要打破既有學科與領域的界線，形成一個針對中共「混合作戰」 (hybrid warfare) 下，「混合式影響力分析」的視野：「五星廟」可能是統戰工作與地方選情上的彼得困境，對於「反獨促統」只有產生負面的效果，但從認知作戰的角度來說，這件事情可能也給了中共很好的機會，去「再教育」海內外的「小粉紅」與「愛國人士」，那「島內一小撮臺獨分子」是如何地「頑固」、如何需要動員他們去對抗其「囂張氣焰」。¹¹ 透過這個更全面性的分析視野，最終

10. Joseph Samuel Nye Jr., "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4, July-August 2009, pp. 160-163.

11. 例如國臺辦發言人安峰山在記者會中詮釋彰化縣政府依法拆除「五星廟」的行為是「暴露民進黨有些人一邊放任縱容臺獨分裂行徑，一邊打擊和迫害主張統一的臺灣人士」。中國臺研系統的學者更帶風向說這是「說明臺獨勢力對統派的忌憚」。〈彰化碧雲禪寺被拆等案 中國反應強弱有

我們要知道，民間交流有沒有像奈伊所說的，是被「武器化的軟實力」(weaponized soft power)，¹² 成爲在混合作戰型態下影響力工程的一環？民間交流是否間接成爲一個發揮威權輸出的管道？也就是中共運用宗教交流建立統戰網絡、資訊網絡，以及論述方向，以間接支援銳實力或認知作戰的方式，來試圖動搖臺灣的民主機制。

本文以下將先摘要與比較三種研究範式中呈現的分析框架與主要案例，整理出三種定義、操作指標與優缺點之後，使用奈伊啓發的「混合式影響力分析」概念，作爲分析中共在民間宗教交流中，使用不同手段組合與交錯運用的可能性，進一步去梳理目前宗教交流研究呈現的各項議題成果與不足之處，並在結論提出理論的比較總結，以及對未來的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的建議。

貳、統戰、銳實力與認知作戰：理論與案例

一、統一戰線

中共統戰理論的源頭來自毛澤東，他也奠下歷任領導人統戰政策的闡述基礎。毛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定調統戰核心原則爲「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更標榜統戰是戰勝國民黨的「三大法寶」之一。而周恩來則是統戰執行層面上的實際推手，例如他在〈論統一戰線〉一文提到，統戰成功的關鍵是要成功區分敵人、隊伍和司令官這三個角色，就是要能夠正確地認清當下黨的主要敵人，有效地組織黨外的統戰隊伍與之對抗，以及鞏固這個戰線在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下。也就是在這個工作方針之下，中共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別〉，《今日新聞》，2018年9月26日，<<https://www.nownews.com/news/2983705>>。

12. Joseph Samuel Nye Jr.,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14, No. 1, February 2021, pp. 199-200.

確認了毛的「司令官」地位，以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為號召，重新團結更多人加入其隊伍，試圖把「敵人」聚焦在國民黨而非所有的資產階級。¹³

我們可以據此定義統戰作為一種中共影響力工作，是在某一個特定人民群體裡，例如宗教信仰者之中，去「團結、教育、改造」出一支「統戰隊伍」，使其配合「司令官」（黨中央）的需要去打擊、分化或孤立所謂的「敵人」。而這個「敵人」，在習近平時代的定義非常廣泛，從溫州「不聽話」的教會牧師，到美國批評新疆人權的國會議員，都可以包括其中。根據 2021 年 1 月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統戰「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者的聯盟」。它將統戰思想擴張，從「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等於是將統戰從過去籠絡、分化與壓制潛在社會競爭者的消極目的，擴大為積極配合中國崛起之後，爭取世界話語權與意識形態陣地的重要手段。

有關統戰研究的文獻非常龐大，但實際案例的一手研究卻非常有限，這跟統戰活動的祕密性有關，例如中國出版的統戰研究，偏好強調最高領導人如鄧小平對統戰的「理論貢獻」而非實質手法與政策。他的「黑貓白貓」論放開了意識形態的限制，讓黨員幹部可以放手去「團結」黨外的社會力量，用來發展國內與海外的統戰隊伍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等階段性目標；¹⁴但這些出版品對於實際執行這些政策的

13. 周恩來，〈論統一戰線〉，1945 年 4 月 30 日，《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zhoulai/219.htm>>。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論統一戰線》（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 年），頁 156。

統戰隊伍是誰、做了什麼事則是著墨甚少。針對政協與民主黨派的國際研究則發現，鄧小平藉由「撥亂反正」之名，恢復統戰部旗下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以及民族宗教人士等非黨社會菁英的合法地位，重新把他們納入統戰工作的隊伍之中，期待他們能出去說服更多人，尤其是港、澳、臺，以及其他華人社會中的菁英，能夠認同並加入中國改革開放的行列之中，讓這些海內外力量成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助力。¹⁵

也是在同一個團結促進發展的原則下，中共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在香港與澳門回歸之後，對臺工作可以說是當前中共統戰最重要的目標與外界最關心的案例。鄧小平在 1978 年推動中美建交的過程當中，多次保證新一階段的統一目標是要讓「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某些制度可以不動」；這些談話也成為後來對臺統戰「一國兩制」政策的濫觴。¹⁶面對臺灣變化的政局與日漸高漲的獨立聲浪，中共對臺統戰從「以商逼政」到「地方包圍中央」，在手段與策略上不斷變化，¹⁷但「一國兩制」至今仍為中共對港、澳、臺官方政策的核心論述，顯見中共統戰

15. Gerry Groot, *Managing Transi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and Hegemon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3.

16. 雖然臺灣才是真正的目標，但 1979 年 1 月人大常委會於中美建交同一天發布的《告臺灣同胞書》中，並沒有包含「一國兩制」一詞，當時僅僅是提出「和平解決」及「尊重臺灣現狀以及各界意見」等空泛的原則。「一國兩制」論述的首次實踐，事實上是在香港回歸的談判之中，其首次出現於正式文件是在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田姝，〈鄧小平與「一國兩制」的構想和實踐〉，2019 年 4 月 11 日，《鄧小平紀念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411/c69113-31025215.html>>。

17. 郭瑞華，〈地方包圍中央：中共對臺新策略與挑戰〉，《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17 卷第 4 期，2019 年 4 月，頁 143-159。

工作的整體性與延續性。

整體而言，以毛周鄧三人、建政前後、改革開放前後時期為區分的研究，主導了主要的統戰研究途徑，但這個取向顯然是不足的，尤其海外的研究忽略了中共統戰能依據客觀情勢調整敵人與隊伍的特點。¹⁸ 近期觀察者多注意到，相比江澤民、胡錦濤任內沒有特別更動統戰系統的配置，習近平上任後，他改變或強化前任領導人所建立的制度，並在黨和政府體系中建立了新的規範，統戰系統更是被其所重視，有所謂「大統戰」策略的出現，尤其是本文所關心的負面影響力手法，在習近平時代更為突出與明顯，但相關研究仍然有限。¹⁹

這些強化與擴張措施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社會多元化、統戰系統官僚化，以及統戰隊伍老化的多重影響之下，統戰工作長期被批評為「請客吃飯」。尤其近年統戰工作在市民社會與港臺等海外場域接連失利的背景下，這些針對海外對象排擠、孤立、分化等負面鬥爭手法，更成為新時期統戰工作的重要特徵，而如何理解這些「不是請客吃飯」的新統戰手法，是研究者的重要挑戰。

二、銳實力

相對傳統的統戰研究，銳實力的視野更重視這些明顯是習近平時代才出現的「新」手法。有關中共銳實力的文獻中，近年有非常多的知名國際研究者與著作出現，著重在中國的海外「影響力工程」或「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

當前銳實力的討論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18. 楊開煌，〈中共「統戰會議」之分析—兼論兩岸學界對統戰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卷第2期，2001年4月，頁97-133。

19. Ray Wang & Gerry Groot,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August 2018, pp. 569-583.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在 2017 年 11 月所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事後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研究分析部副主席沃克 (Christopher Walker) 與研究員路德維希 (Jessica Ludwig) 在知名的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上整理提出。他們主張中國的海外教育機構「孔子學院」，或俄羅斯的新聞機構「今日俄羅斯」(RT) 這樣組織的存在，模糊了傳統硬實力（以一國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去脅迫對手改變外交政策）與軟實力（以市民社會組織的力量，去展現一國在文化、政治思想，以及政策上的吸引力）之間的界線，因為這些機構打著「民間組織」的外衣，但既不是在展現一國文化的魅力，也不是真正想要贏取民心，其核心目標是要分散注意力及操縱輿論，配合其政府的硬實力目標的外交政策。²⁰

銳實力的操作指標主要以輿論與選舉操縱為主，可以視為是資訊戰中透過民間組織去執行訊息操縱和輿論戰中的一環。沃克在其與民主理論大師戴蒙 (Larry Diamond) 及《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主編普拉特納 (Marc F. Plattner) 合編的論文集，就已經提到這個威權政權對外輸出影響力的現象，他稱之為「威權工具箱」(authoritarian toolkit)，包含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 (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ONGOs)、殭屍選舉監督員 (zombie election monitors)，以及資金充足的國際媒體集團。²¹

「威權工具箱」利用本身體制和民主社會之間開放度的不對稱 (asymmetry of openness)，影響全球公眾的觀感和行為，討論者最常

20. Christopher Walker &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November 16, 2017,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21. L.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 Christopher Walker,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256.

引用的例子，是俄羅斯利用社群媒體干預美國 2016 年總統大選，以及中國試圖利用廣大市場脅迫歐美媒體、電影和大學對敏感議題與人物的自我設限。²² 在 2021 年《外交事務》上另一篇文章中，沃克與路德維希再度討論中國與俄羅斯兩位獨裁者的「長臂」，這一次他們的「工具箱」中更加上控制新科技的標準設定，以及戰略地利用他們的商業和金融關係。²³

因為銳實力主要以輿論與選舉操縱為主，中共對這一個概念的內涵、推動它的沃克本人，以及背後的贊助者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所發動的一系列國際輿論攻防戰，本身就是一個銳實力的經典案例。與捍衛新疆問題時的程序類似，中共的大外宣機器在國際媒體與社群媒體上發動輿論戰，先攻擊美國本身在這些議題上也有同樣的問題，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本身也接受白宮和美國國會的持續資金支援，也是一個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因此批評中國操縱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是「雙標」；其次是蒐集大量資料佐證，沃克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都是「遵照美國政府命令，採用資金資助形式操縱、指揮全球多家非政府組織向目標國家和地區輸出美國價值觀、實施顛覆滲透破壞、煽動所謂『民主運動』」。中共指控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實質上是美國政府的「白手套」、「第二中情局」，「反華組織」服務美國戰略利益，因此美國人才是「銳實力」的始祖。例如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站的一份一萬兩千多字，中、法、英、俄、西班牙語併陳的文件

²² Joseph Samuel Nye Jr.,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January 24, 2018,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cid=nlc-fa_fatoday-20180124>.

²³ Christopher Walker & Jessica Ludwig, "The Long Arm of the Strongman: How China and Russia Use Sharp Power to Threaten Democracies," May 12, 2021,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long-arm-strongman>>.

中，指控「NED 成爲世界各地分裂暴亂、顏色革命、政治危機、謊言謠言、價值滲透的幕後『黑手』，罪惡事實罄竹難書。」²⁴

銳實力鬥爭的範疇以配合外交戰爲主，看似是中國外交部主管的業務，但顯然也包含在中央港澳辦與國臺辦的統戰業務中。在 2022 年 5 月一場安排好的外交部記者提問中，發言人汪文斌唸稿般地細數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多年來的「罪狀」，包含香港的「修例風波」（反送中），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會長威爾森 (Damon Wilson) 於 5 月 27 日率團訪臺，並將於同年 10 月在臺北舉辦「世界民主運動」全球大會一事，是「以『民主』爲旗號替『台獨』勢力站台，服務『以台制華』戰略的圖謀」；「過去沒有得逞，現在和將來更不可能得逞」。²⁵

因爲英文使用者更常使用銳實力去描述中國負面影響力作爲，而這個名詞的創造，正是從新自由主義理論大師奈伊所創的軟實力延伸而來的，因此銳實力的定義要放在國際關係的語境下去理解比較合適，而且使用對象也不僅是中國，可以泛指所有威權國家政府，試圖以看似合法公開的軟實力途徑，例如公民外交或學術活動，去包裝與掩飾其軍事或政治野心的各種作爲。例如中國國務院漢辦負責的「孔子學院」，就是最常在中文學術出版中提到的銳實力工程。²⁶ 但這種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2022 年 5 月 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

25. 劉曉琰，〈反華組織 NED 將於 10 月在臺北辦「民主大會」，外交部揭批該組織罪行〉，《環球網》，2022 年 3 月 29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OCp6lyzWv>>。

26. 游智偉、張登及，〈中國的非洲政策：軟實力與朝貢體系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2011 年 10 月，頁 111-156；廖箴，〈兩岸海外漢學推廣的競與合：以「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爲例〉，《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3-138；蕭新煌、楊昊，

銳實力的分析被批評仍停留在表面的、媒體式現象的觀察，缺乏更有系統性的分析。²⁷

孔子學院在法律上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主要的業務是在各國推動中文教育及推廣中國文化，自 2002 年在韓國開設第一所孔子學院開始，許多國際一流的頂尖大學，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荷蘭萊頓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都設有研究中心，許多國家也都接受其在中小學內設「孔子課堂」。²⁸ 對中國來說，孔子學院與行之有年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法國文化協會（法語聯盟）或德國歌德學院，「沒有不同」，這是合法的「文化輸出」。

名義上孔子學院由註冊為民間組織的「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管理，但這個總部設在北京的非營利性組織，其預算提供、人員批審、駐點合約等所有的運作，背後都是由教育部成立的「國家對外

〈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中的角色〉，《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5 卷第 3 期，2014 年 7 月，頁 1-56；劉泰廷，〈孔子學院和中國對東南亞巧實力戰略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3 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97-108；周英，〈孔子學院的海外危機及其原因探析〉，《東亞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2017 年 6 月，頁 39-66；黑快明，〈中國銳實力對澳洲的滲透與澳洲政府的回應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1 卷第 3 期，2020 年 7 月，頁 41-109。

27. 王宏仁，〈「銳實力」概念於「後」中國崛起時期之理論化探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3 期，2019 年 9 月，頁 1-23。

28. 根據中國政府公開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國已在 154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 548 所孔子學院和 1,193 個中小學孔子課堂，現有註冊學員 210 萬人，中外專兼職教師 4.6 萬人。其中以歐洲有 43 國設立了 184 所孔子學院和 331 個孔子課堂最多。中國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批評漢辦直接複製中國「標準答案式的教育」，是失敗的根本原因。田宇辰，〈孔子學院和李子柒，文化輸出到底該 Pick 誰？〉，2020 年 7 月 10 日，《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58628529>>。

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或 2020 年後因為備受批評而改名的「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所主導；而負責出面與各國學校簽約的「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號稱是由中國各大學與企業共同贊助的「公益組織」，但在歐洲與美國大學中的孔子學院，都傳出干預學術自由的案件，學者呼籲要關閉孔子學院的聲浪不斷，²⁹但在東南亞、中東，以及非洲等地，孔子學院提供的免費中文課程仍然非常受到歡迎，並在這些社會中發展出綿密的政府與非政府關係的網絡。³⁰從 2014 年開始，孔子學院在歐美的數量急遽下降，美國各州陸續關閉了 60 家孔子學院；歐洲的瑞典、比利時等國也先後將該國的孔子學院全部關閉。2020 年 8 月 13 日，美國將孔子學院列為外國使團，認定其為準政府機構。³¹

對銳實力的研究者來說，挑孔子學院是「軟柿子」，因為分布在 154 個國家和 548 個校園中的孔子學院，提供了幾乎不用刻意尋找證據的批評對象；關閉這些明顯是政府出資的教學機構，其政治與法律成本也非常的低。但對於各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辨識中國其他哪些民間行為者是獨立的，以及哪些是黨國代理人，一直是相當困擾的問題，而現有孔子學院的研究幫助有限。早在華為案爆發之前，國際關係學者就已對中國在跨國市場、國際社會與聯合國場域中的「非政府行為者」的本質爭辯不休。例如長期鼓吹國際合作與互賴的奈伊，早在 2017 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研討會之前 10 年，就曾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報告中警告，中國企圖利用企業、媒體與

29. "Confucius Says,"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3, 2014,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4/09/13/confucius-says>>.

30. 蕭新煌、楊昊，〈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中的角色〉，頁 1-56。

31. 因為是 NPO，改為在中國民政部註冊。〈孔子學院：防範與爭議中改頭換面的中國文化機構〉，《BBC 中文網》，2020 年 7 月 6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308869>>。

非政府組織實施影響力工程，需要特別區分與留意，但在「中國熱」正在上升的 2007 年，沒有政策執行者把他的警告當一回事。³²

更糟糕的是，銳實力框架遭遇了美國政黨顏色政治的污染，因此學者使用這些名詞時要小心被貼上標籤。「巧實力」一詞最早是 2004 年由諾塞爾 (Suzanne Nossel) 在《外交事務》中提出，也收錄在奈伊同一年的名著《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當中。奈伊本人在 1994 年到 1995 年時服務於柯林頓總統的國防部，軟實力與巧實力等名詞後來也成為柯林頓、希拉蕊等民主黨政治人物提出對中國接觸時「巧實力戰略」的核心，也因此此一概念具有強烈的民主黨外交政策色彩，也被美國共和黨人士視為「親中」的綏靖戰略。例如「巧實力」主張，就被美國資深外交官、前駐聯合國大使阿德爾曼 (Ken Adelman) (共和黨) 譏笑為「真不巧實力」(not-so-smart power)，因為奈伊主張的背後，仍是依賴貸款、援助及人員交流等自由主義之「軟實力」計畫，而這些接觸主義計畫已在習近平時代被證明效果非常有限，因為這些計畫要在中國成功實施，都需要通過政府審核而難以實現。³³

三、認知作戰

傳統上，認知作戰一詞具有高度的軍事用語色彩，認知作戰一般

³²Richard L. Armitage & Joseph S. Nye Jr.,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2007), pp. 1-90, CSIS,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sissmartpowerreport.pdf>>.

³³原句為 “To put it simply, the soft-power agency consented that anti-dictator programs appropriated by the U.S. Congress first get approved by that dictator.” Ken Adelman, “Not-So-Smart Power: Go Ahead, Congress, Cut Away at U.S. Foreign Aid,” April 18, 2011,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4/18/not-so-smart-power/>>。

指一國政府利用媒體、網路等資訊改變其他國家人們的意識、認知、作為或決策。³⁴ 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認知作戰的定義類似銳實力：「利用爭議訊息，破壞社會既有網絡，並加深原本之對立」。³⁵ 認知作戰近來更因為俄羅斯 2014 年侵略克里米亞，以及 2022 年的烏克蘭戰爭而廣受關注，論者多舉俄羅斯在戰爭前發動所謂烏克蘭納粹分子的「假旗」(false flag) 行動，提供武裝入侵的正當性；戰爭期間鼓動反政府親俄民眾「開門迎王師」的資訊戰，以及戰爭後製造假公投等手法，作為認知作戰研究的經典案例。³⁶

根據瑞典國防大學學者嘉特納 (Margarita Jaitner) 為北大西洋公約 (NATO) 做的克里米亞研究，俄軍把網路世界軍事化與安全化發展得很早，也在 2014 年的衝突中充分實踐出來。俄羅斯對認知作戰的定義是，在任何指定的影響範圍內，包括對技術數據和認知訊息，以及心理行動或心理戰 (psychological warfare) 的攻擊和防禦。嘉特納引用俄軍切金諾夫 (Sergei Chekinov) 上校和鮑格達諾夫 (Sergei Bogdanov) 少將的話指出，認知作戰必須在傳統軍事行動開始之前就發動；要利用訊息來破壞對手的有效治理、組織反政府抗議活動，迷

³⁴Martin C. Libicki, *What is Information Warfa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5.

³⁵Juan Pablo Cardenal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pp. 1-156.

³⁶Margarita Jaitner,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Lessons from Ukraine," in Kenneth Geers, ed., *Cyber War in Perspective: Russian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Tallinn: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 (CCDCOE) Publications, 2015), pp. 87-94；施正鋒，〈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21-50；Keir Giles, *Handbook of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Roma: NATO Defense College, 2016), pp. 1-90；曾柏元，〈俄羅斯運用社群媒體進行資訊戰之分析—以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為例〉，《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7 卷第 576 期，2021 年 4 月，頁 43-68。

惑對手、影響輿論，降低對手的反抗意志。³⁷

從文獻發展的軌跡來分辨，認知作戰與銳實力一樣，研究的焦點都是訊息媒介與訊息操弄，但每一個國家存在國際社會之中，都自然會有進行認知操作或試圖提防敵方對己進行認知作戰的企圖與能力，所以認知作戰相對來說是一個沒有特定對象的詞彙，而銳實力特別著重於威權體制對於政府控制的非政府民間組織（例如中國人權研究會）、社群與國際媒體（例如抖音或中國環球電視網），以及跨國企業（例如華為）的操作，雖然重點仍然是訊息的扭曲與人們認知的改變，但負面的色彩明顯，而且幾乎用來專指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國家，³⁸ 僅有少數的研究會包括伊朗。³⁹ 也因為這個針對性，無怪乎中國官方對認知作戰的指控少有回應，但強烈指控銳實力是「中國威脅

³⁷Margarita Jaitner,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Lessons from Ukraine,” pp. 88-89.

³⁸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 July 2018, pp. 9-23; Taehwan Kim, “Authoritarian Sharp Power: Comparing China and Russia,” *The ASAN Forum*, June 18, 2018, <<https://theasanforum.org/authoritarian-sharp-power-comparing-china-and-russia/>>; Andrew Foxall & John Hemmings, “The Art of Deceit: How China and Russia Use Sharp Power to Subvert the West,” December 19, 2019, *Henry Jackson Society*, <<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publications/the-art-of-deceit-how-china-and-russia-use-sharp-power-to-subvert-the-west/>>; Christopher Walker & Jessica Ludwig, “The Long Arm of the Strongman: How China and Russia Use Sharp Power to Threaten Democracies.”

³⁹Olga G. Leonova, “Sharp Power – the New Technology of Influence in a Global World,”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3, No. 2, February 2019, pp. 21-28; Paolo Messa, *The Age of Sharp Power: China, Russia and Iran: The Interference Is Not Soft. The Italian Case* (Milano: Bocconi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144.

論」的同義詞。⁴⁰

在臺灣的文獻中，因為討論的對象清一色是中共對臺灣的影響力工程，認知作戰一詞反而更常與統戰而非銳實力混用，兩者都被歸類為心理戰討論的一環，將中共心理戰按施展的對象，區分為「統一戰線」、「指揮謀略」與「瓦解敵軍」三個種類；⁴¹而中國的文獻則常使用「信息戰」、「超限戰」或「三戰」（法律戰、心理戰與輿論戰）。⁴²其中超限戰概念類似「混合戰」，指包含三戰手段的影響力工程，而三戰的概念皆可包含於資訊戰當中，但資訊戰操作概念上以敏感訊息的流向、控制與操弄為主，忽略了以民眾為主體的新議題，例如數位極權及海外個資的蒐集，因此相對統戰與銳實力來說，認知作戰定義上可以說最為廣泛，可以包含三戰、資訊／信息戰、超限戰在內的所有影響力工程。⁴³

文獻中提到的認知作戰操作指標很多，所有可以用來偷竊、植入、攔截、操縱、扭曲或摧毀訊息的各種途徑，都可以算是認知作戰的工具，包含但不限於駭客行動、殭屍電腦、內容農場、推播假新聞的社群媒體機器人 (social bots)、網軍 (五毛)「洗版」或「帶風

40.〈王國慶：所謂的銳實力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本〉，《新華網》，2018年3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2/c_137011380.htm〉。

41.陳津萍、徐名敬，〈中共「心理戰」與「認知域作戰」發展之比較研究〉，《復興崗學報》，第118期，2021年6月，頁124。

42.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兩個空軍大校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1-263；張瑞忠、劉雪梅，《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300問》（北京：軍事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115；程寶山主編，《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基本問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46；郭雪真、洪陸訓，〈中共心理戰的研發與戰備〉，《復興崗學報》，第89期，2007年6月，頁9-10。

43.沈伯洋，〈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2020臺灣選舉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2卷第1期，2021年1月，頁1-65。

向」、假名人之名的網站、「深度偽造」(deep fake)的假聲明、真與假訊息混雜的「事實查核」網頁或「懶人包」、刻意製造對立的「網路酸民」(online troll, 類似臺灣 PTT 上的「反串文」)、真假難辨的簡訊或即時通訊訊息、非正規的街頭民意調查或網紅短片等。⁴⁴ 沈伯洋將中國資訊戰的進攻模式分類為外宣模式、粉紅模式(背後是由共青團系統主導)、農場模式(以網路內容農場為假訊息產製與傳播中心),還有透過在地協力者進行操作的協力模式。⁴⁵

在今日人人都隨時用智慧裝置連網的情況下,可以說在有電腦、有手機、有平板電腦的地方,就會發生認知作戰,而且行動牽涉的數據量都非常龐大,這也讓以認知作戰為名的分析取材非常困難,除非有大型網路服務商的配合,或是國家級的網路安全機構介入,這些行動才能夠被充分地曝光。例如臉書、推特與 Instagram,在 2016 年俄羅斯介入美國總統大選曝光,以及面臨社會輿論大加撻伐之下,才有展開清理「俄國五毛」的工作,也才發現俄羅斯認知作戰對美國社會輿論介入的深入與手段的縝密。⁴⁶

從後見之明來說,這些以假訊息為主的輿論或社群操縱,當爭議的浪潮退去之後,虛假的網站、製造對立的網軍、真實的政治企圖被揭穿之下,「誰沒有穿褲子」是一目了然,成熟民主法治國家可以利用檢調司法機制,加上人民團體、政黨、媒體彼此的監督制衡,通常都可以從中迅速學到教訓,以立法或司法行動去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對民主社會的傷害可以迅速回復。例如以俄羅斯假訊息來解釋川普的當選,顯然是過度高估了這些認知作戰的效果、低估了美國社會族群分歧之深,以及民眾對華盛頓政客與僵化的體制原本就存在的憤

44. Keir Giles, *Handbook of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p. 4.

45. 沈伯洋,〈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頁 4。

46. 〈涉嫌干涉美國大選的「俄國五毛」戰術非凡〉,《BBC 中文網》,2018 年 2 月 19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120555>>。

怒。⁴⁷

因此能夠造成國家安全等級上真實的傷害，還是需要真實軍事行動的配合，或是一國的內部分裂對立到達爆發暴力衝突的臨界點。例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假旗」、假公投，以及網路認知作戰之所以「有效」，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烏克蘭原本就有嚴重的親俄與反俄的分裂；烏東武裝民兵與親俄政團的存在，給了認知作戰最好的土壤。因此應付認知作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專家小組的建議是：提高意識 (awareness)，因為應付認知作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正確辨識有一個作戰正在進行，而不是進行亂槍打鳥式的防堵；認知作戰行為者通常都有一些明確的「簽名」(signatures) 特徵可以辨識，而針對這些特徵發展早期預警與監察系統，可以幫助降低第一時間的衝擊。⁴⁸

參、綜合討論

表 1 整理了統戰、銳實力、認知作戰三個文獻群所提供的定義、操作指標，以及分析上的優缺點。可以看出三者雖然好像關心同一個

47. 2016 年的選舉結果的確讓許多民調專家在民眾眼中失去信譽，但仔細觀察之後，政治學者一般的結論都認為差距在科學誤差的範圍內。Alan Abramowitz, “Did Russian Interference Affect the 2016 Election Results?” *Sabato’s Crystal Ball*, August 8, 2019, <<https://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did-russian-interference-affect-the-2016-election-results/>>; Alan Abramowitz, *The Great Alignment: Race,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196。

48.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May 20, 2021, *NATO Review*,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l>>.

威權境外影響力的現象，但提出的重點與觀察項目不完全相同，也因此各有其優點與盲點。民間交流的社會空間，往往穿越主權國家的領土範疇，因此威權影響力的問題，涉及國家對這些社會空間的治理問題，顯然不可單純視為個人權利與義務的問題，民間宗教交流受到他國操作影響力的可能性應該要被重視，未來還需要更細緻討論。但三者集合起來，應該也提供了目前學術界能力所及的、最全面的「混合式影響力分析」的基礎。

在已發表的研究中，統戰與銳實力兩個概念的使用有相重疊之處，使用者慣常以「中國境內」與「海外」兩種環境作為區分，似乎中國境內或華人 (Chinese) 圈子內的中國影響力工程屬於統戰，在其他國家或對「外國人」的影響力作為就是銳實力，但銳實力也常被英文使用者用來描述廣泛的統戰行為，例如「五星廟」事件就被國際媒體歸類為中國銳實力的一環，這可能跟國際研究者較不熟悉統戰一詞有關，但兩個名詞的混用產生了很多分析上的問題，以民族或國界作為兩者的區分問題更大，例如臺灣人算不算是「華人」呢？香港是境內還是境外？中國學生在澳洲大學騷擾正在抗議送中條例的香港學生，算是統戰還是銳實力？

認知作戰也常和銳實力混用，因為兩者都關心被利用來傳遞惡意或分化訊息的「假」民間組織或大外宣新聞媒體。假新聞 (fake news 或 false news) 雖然被很多人認為是認知作戰的核心陣地，是防堵威權國家滲透分化手段的重要戰場，但最新的研究顯示，假新聞或是具有敵意的假新聞製造者的影響，很可能被高估了；而過度依賴司法工具與反情報機構去處理假新聞或銳實力的結果，更可能會造成社會更多的分裂，反而變成認知作戰的溫床。⁴⁹

49. 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 Sinan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Vol. 359, Issue 6380, March 2018, pp. 1146-1151.

表 1 統戰、銳實力、認知作戰分析框架的比較

	定義	操作指標	分析上的優點	相關研究的盲點
統戰	吸收社會菁英組成統戰隊伍，使其配合黨中央政策的需要去分化、孤立與打擊「敵人」	12 大類社會菁英：政協、人大；運作港澳臺和海外華僑的「和統會」、「工商聯」等統戰外圍組織	偏重偽公民社會組織這種由下而上的影響力工作，透過理解行為者彼此的關係，中共與統戰對象的對價關係比較容易辨識	以國內目標為主，對於中國境外對象解釋力沒有銳實力來得清楚；對於新媒介與新階層的統戰工作也才剛剛起步
銳實力	軟實力機構被用來配合硬實力在外交目標之上，用來分散注意力及操縱輿論	威權工具箱：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殭屍選舉監察員、國際媒體集團、新科技的標準設定、跨國企業的商业和金融關係	偏重文化輸出這種由下而上的影響力工程。對於宗教、文化、學術等意識形態陣地議題解釋能力較強。因執行者定義最具體，對於中共影響力分析最具有操作性	以海外目標為主，對於中國境內的對象解釋能力弱；中共與其銳實力對象的對價關係不容易解釋，同時對於影響力大小的判斷不清楚
認知作戰	利用爭議訊息，破壞社會既有網絡，並加深原本之對立	假訊息、假旗，以及配合軍事行動的資訊戰、心理戰與法律戰	偏重國家級駭客、網路媒體與社群媒介操縱等由上而下的影響力工程。關注對民調與選舉結果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共影響力效能分析最具體	需要數據獲得的能力研究門檻高。僅重視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議題，對於宗教、文化、學術等其他重要意識形態陣地議題關注不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討論，這三大文獻群體捕捉了現今中共執行境外影響力工程的樣態、操作的主要對象，以及分析上碰到的問題。現在要問的關鍵問題，也是最常被媒體討論到的案例，就是中共利用宗教滲透與

發揮負面影響力的作為，到底是統戰、銳實力還是認知作戰？或是更直接地說，兩岸宗教交流有沒有成爲一個中共發揮境外影響力的管道？

一、兩岸宗教交流的各項議題

目前兩岸宗教交流的研究仍在發展的階段，但初步已經有一定的成果。目前以針對宗教交流活動本身、對臺灣內部的影響，以及中國內部因素分析，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⁵⁰ 第一類發展得比較早，啓發於 1999 年大甲鎮瀾宮媽祖進香突破兩岸直航禁忌之後，宗教在兩岸關係中的新角色。⁵¹ 張珣最早提出「文化媽祖」一詞，民間信仰中的官民權力角力有其深厚的文化歷史淵源，其中媽祖中國進香不僅衝擊臺灣的政教關係，也用文化與觀光作爲契機，給中國媽祖信仰的復興帶來機會與動力。⁵² 黃寶瑛著重慈濟在中國的活動，歸納過去兩岸宗教交流存在的五個交流模式，包括尋根謁祖、講經弘法、宗教節慶、慈善救助及宗教學術。⁵³ 張家麟認爲中共的宗教「軟實力」手法靈活，利用類似「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活動增加其影響力，「寓統戰於宗教」逐步產生潛移默化作用。⁵⁴

50. 分類的原因是因爲學者研究雖多，但研究者因爲本身學門視角或取材限制等理由，生硬地切分成三個區段，就全面性地理解中共對臺影響力工程來說，是不合理的，這也造成學術界對於中共對臺宗教工作的真正影響仍莫衷一是。

51. 公孫策，〈媽祖直航〉，《商業周刊》，第 593 期，1999 年 4 月，頁 14-24，《商業周刊》，<<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7551>>。

52. 張珣，《媽祖·信仰的追尋：張珣自選集》（臺北：博揚文化，2008 年），頁 1-349；張珣，《文化媽祖：台灣媽祖信仰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頁 1-259。

53. 黃寶瑛，〈在兩岸政教關係中的宗教交流：以慈濟模式爲例（1991-2008）〉，《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 8 期，2009 年 10 月，頁 73-110。

54. 張家麟，〈中共軟實力分析及我應用對策—從宗教軟實力論述〉，《中

第二種關注臺灣社會內部，對於中共影響力的宗教「接受者」。古明君、洪瑩發探討中共利用「五緣策略」，透過「信仰買辦」將臺灣的宮廟與中國的廟宇組織、地方政府、對臺辦系統與統戰部門連結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制度化的網絡關係；⁵⁵ 劉怡寧比較臺灣佛教四大山頭的中國關係，發現它們的「中國情感」相異，加上對中國「宗教市場」的不同考量，形成不同的接觸模式。吳介民總結相關的研究，表示不同的社群都有其中共對臺發揮影響力的「在地協力者」，而臺灣的宗教組織是「中國因素」對臺灣民主發揮作用的重要管道之一。⁵⁶ 古明君總結這是中共的一種宗教「文化化」策略，以文化取代宗教的主體位置，並用文化傳播取代宗教發展，以文化交流為名讓宗教配合一帶一路政策，推動更多海洋絲路國家的聯繫交流，作為黨國發揮境外影響力的工具。⁵⁷

第三種強調因為中國獨特的黨國體制影響下，跨境交流牽涉的複雜互動，與不同宗教之間的巨大差異。黃克先發現臺灣基督教會對中國教會的投入與影響都很大，⁵⁸ 也因此兩岸宗教交流中處在一個兩邊都受到政治壓力的敏感地位，擔心其行動會觸及中國或臺灣的政治

共研究》，第 43 卷第 5 期，2009 年 9 月，頁 114-117。

55. 古明君、洪瑩發，〈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左岸文化，2017 年），頁 289-324。

56. 古明君、洪瑩發，〈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頁 289-324；劉怡寧，〈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左岸文化，2017 年），頁 325-366。

57. 古明君，〈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103-132。

58. 黃克先，〈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變〉，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左岸文化，2017 年），頁 367-394。

紅線。王韻比較臺灣的基督教、道教與佛教在中國不同的發展，提出跨境宗教交流是一種同時具有抗議者、倡議者，以及機會主義者在其中互相角力的一種複雜互動過程。⁵⁹張貴閔跟隨臺灣宮廟頭人參與「統戰團」，發現統戰是一種特殊的展演，參與者多半是只有在中國境內的統戰場合上，才會配合「演出」，與回到臺灣之後的言行完全不同。⁶⁰陳宥喬研究臺灣媽祖聯誼會在中共合法性工程中的角色，發現它們並不是單純的「中共代理人」，而是具有複雜能動性的主體，只是中共需要這些臺灣團體持續地參與，以滿足其在宣傳合法性上的需要。⁶¹

二、兩岸宗教交流的「混合式影響力分析」

從以上簡單回顧兩岸宗教交流的最新研究成果，除了張家麟的研究之外，我們會發現除了統戰，銳實力跟認知作戰兩個途徑都是缺席的，這可能與宗教組織低調與祕密行事的特性有關，而銳實力與認知作戰分析需要的資料較難以取得，使得統戰成爲唯一被廣泛使用的分析工具。而且在所有這些研究之中，尤其是第三類比較新的研究之中，雖然作者都觀察到統戰的現象，共同的結論都是臺灣宗教團體是「被統戰」的對象，而作者們多稱讚宗教團體的自主性與韌性，無論是基督教、道教甚至佛教，都能夠找到在複雜政治環境中發展的生存智慧。回到最重要的問題，宗教交流有沒有成爲一個中共發揮境外影響力的管道？綜合現有的文獻，得到的答案除了極少數的案例之外，

⁵⁹Ray Wang, *Resistance Under Communist China: Religious Protesters, Advocates and Opportunis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4.

⁶⁰張貴閔，〈宗教超然或宗教促統？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的多重場域和行動邏輯〉，發表於「解構銳實力：中國因素 2.0」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19 年 12 月 12-13 日），頁 44-46。

⁶¹陳宥喬，〈一「媽」各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再檢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年），頁 1-192。

大概是影響非常有限。

但是宗教真的沒有任何部分被利用來發動銳實力或是認知作戰嗎？在世俗化的現代資訊社會中，相信宗教可以直接影響全民大眾的輿論，或是全國性選舉的結果似乎是不合理的，但這個假設明顯是跟一般民眾對於臺灣宗教組織擁有龐大政治影響力的印象相違背。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宗教團體明顯地有積極參與政治，⁶²而它們在參與兩岸互動的同時，是否也有自然變成政治上參與者——好聽一點叫做「海峽和平使者」，難聽一點被稱為「宗教買辦」——的可能呢？「政治和尚」與「親共牧師」到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多大？為什麼同樣是神尊來臺巡遊，或是組織類似的大型宗教協會，有的自願成為中國影響力的協力者，有的卻沒有這樣的疑慮？目前沒有任何研究可以對這個差異性提供答案，這顯然是一個明顯的缺憾，有待未來研究補足。

第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宗教交流雖然有成為一個中共發揮境外影響力的管道，但學者受限於其核心問題意識，與跨領域資料蒐集上的困難，沒有特別去注意其他有用的資訊。例如宗教研究者著重像進香團這樣的組織性田野活動，很難去注意到網路或社群媒體上的行為；銳實力研究者也關心組織與活動，但往往只注意有立即性威脅或直接政治影響性的案例（例如選舉時的仇恨動員或對港人潑漆），而對長期與制度性的交流活動注意不多；認知作戰分析會特別注意網路上的假消息與假旗協作等行為（例如臺灣疫情期間大量散布的假消息），但宗教、慈善、教育這一類民間組織性活動，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研究視野之中。

但無論是組織活動還是網路上的言論都來自於「人」，理論上，一位宗教人士可以幫中國組織「統戰團」，當然也可以幫忙在 LINE

⁶²Cheng Tian Kuo,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New York: SUNY Press, 2009), pp. 1-171; Richard Madsen,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218.

群組中散布假消息，協助在選舉時動員支持特定政治人物，或甚至雇人對流亡異議人士潑漆，但實務上，這樣明確的「一條龍」行為個體非常的少（具黑道背景的統促黨與其關聯的宮廟，是少見的例外）。文獻中更多看到的是三群不同的人，低調地成為三種不同的影響力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如何辨識具有代理中共影響力的個體，是三種研究途徑共同的挑戰。

另一個比較樂觀的可能性是，民眾對宗教政治化的印象是有誤差的：臺灣宗教團體的財務自主性與組織韌性，可能使得它們雖然有受到統戰吸引或銳實力的壓力，但不會像需要市場與廣告商的企業或是媒體一樣，輕易變成統戰買辦、銳實力的「威權工具」，或認知作戰的假消息傳聲筒。「五星廟」或大甲鎮瀾宮，以及少數與統促黨有關聯的數十家宮廟，大概是最常被輿論拿來討論的銳實力或認知作戰案件，⁶³ 但這幾個案例是臺灣兩萬多間宮廟中的極少數特例，而以從少數案例推斷所有去中國交流的宗教組織，都是潛在的「中共代理人」，顯然是不合理的。在數十年媒體與學術研究的密切檢視之下（合理相信檢警情治單位也不會缺席），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它們起到破壞社會團結、激化輿論及影響選舉的作用，反倒是因為少數人的違法言行，例如潑漆、推擠或騷擾事件，使得更多人對中共影響力提高危機意識。對比俄羅斯在美國或烏克蘭的影響力工程的細膩程度，如果這些是中共黨政單位指使操作的銳實力或認知作戰工程，只能說中共的執行單位，或許是「彼得原理」產生的困境特別嚴重。澳洲學者格魯特 (Gerry Groot) 因此撰文指出，中共自豪的三大法寶中的統戰，從成果來看可能更像是「自我毀滅的祕密武器」(self-defeating secret

⁶³ 林俊宏、黃揚明，〈白狼自稱中共同路人 統促黨滲透 30 宮廟爆染紅危機〉，《鏡媒體》，2019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1022inv010/>>。

weapons)。⁶⁴

第三個可能性是短期與長期的問題。學者的研究可能限於本身學門的視角，而過度專注在這些團體或個人有沒有明顯與立即受到中共影響的言行，而忽視了這些「統戰目標」雖然可能沒有成功地「被統戰」，但他們對於交流的熱情參與和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可能間接增強了中共推動銳實力（影響臺灣選舉）或發動認知作戰（影響臺灣輿論）的能量。換句話說，大甲鎮瀾宮也許組織上並沒有「被統戰」、沒有變成「中共的同路人」，但鎮瀾宮出面組織臺灣媽祖聯誼會與號召宮廟及信徒前往中國進香的行為，仍然被中共用來對中國民眾與全世界宣傳「臺灣人民心向祖國」、「兩岸一家親」，以及「臺獨僅僅是一小撮的主張」等政治論述，更不用說在關鍵時刻對宮廟頭人與信徒喊話，希望他們在選舉時「對兩岸和平做出明確的選擇」，也就是吳介民等人提出的「在地協力者」的現象。換言之，有些人主張沒有在地協力者，就不會有統戰甚至銳實力的施作點；統戰有沒有效果是一回事，但北京的論述得以透過協力者「插旗」在臺灣輿論與政治市場，是兩岸宗教交流下不爭的事實。

當然這樣的推論並不是要責備參與兩岸宗教交流的臺灣人士與團體；取締「在地協力者」更會留下干預宗教自由的疑慮。利用與被利用本來就是交流與接觸的一體兩面，因此也有人主張，如果臺灣在其中得益高於弊，又何必必要故步自封呢？要真正回答這個宗教交流的利弊得失，顯然不是本文篇幅可以處理的問題，所以作者打算回頭聚焦在兩岸民間交流政策制定的原則之上：就算人民團體有被利用、被統戰、被銳實力與認知作戰「武器化」的風險，臺灣政府與社會仍然應該支持兩岸宗教交流嗎？

64. Gerry Groot、林鈺鈴，〈自我毀滅的秘密武器？統合主義對統一戰線的制度性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62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24。

簡單的答案是：是的。理由除了對民主與自由價值觀的信心之外，防禦方在面對威權滲透時必然面對的兩種困難，可以在「混合式影響力分析」這樣更全面的視野中，獲得有效的幫助。第一，防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成功辨識對手是誰、是誰在使用這些手段，但現實是敵人與朋友難以區分，就像是區分軟實力與銳實力一樣困難，因此研究同時需要三種分析視野，並對三種威權工具都加以留心；從區分統戰、銳實力與認知作戰的過程中，找出真正的對手是誰。這樣混合式分析最大的好處是，就算「代理人」找不出來或辨識困難，但研究者利用三者的定義與操作指標，仍可以有效地推論幕後真正的「指使者」，因而推斷其真正的目的與未來可能的影響。

例如從組織分工上來說，統戰發動者當然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其下轄的「代理人」；銳實力則多來自外事單位，例如外交部與國安部；認知作戰則比較多是解放軍與國安單位所屬的網軍單位在執行。利用這樣的基礎知識，就不難分辨「五星廟」這樣的事件，特別是它被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民族思想愛國基地」一事，與中國政府機關直接的關聯性大概不高，背後很難有統戰部或國安部這樣的政權機構在操刀，比較多的介入是相關單位利用這個事件的後續高知名度，對國際與國內進行輿論操作；這個操作說好聽一點是「認知作戰」，但實質上更多是在強化原本的「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因為這樣事實清楚的地方產權爭議，只有對於已經接受中共論述的支持者有影響，而對國際與臺灣社會大部分人來說，只有強化中共負面形象的效果。

第二種困難是，研究者如何知道對手真的正在有計畫地混用三種手段呢？還是只是隨著情勢看招出招？這牽涉到要如何判斷哪一個是真正的行動、哪一個是「假動作」，而區別三者行為（不是單純地混用）可以更有效地分辨真實目的與假目標。如果防禦方不仔細分辨，非常有可能會發生牽連無辜或矯枉過正 (overkill) 的問題，這也是為何「查水表」常常成爲臺灣社會中爭議的原因之一；這些不恰當的反

應，都會阻礙有效的反制作為。

例如國臺辦或「小粉紅」針對「五星廟」的發言與攻擊，顯然就是標準的假動作。具備充分黨國體制知識的研究者就會知道，第一，國臺辦並非宗教事務的主管機關、「小粉紅」也對兩岸宗教交流（這是統戰部壟斷的權力）插不上嘴；第二，宗教統戰講的是「五緣」、強調要「搞好關係」去發揮政治影響力，目的很清楚是要在政治市場上發揮反獨促統的作用，但這一件事不但沒有「反獨」成功，反而讓民進黨籍的縣長魏明谷賺到一個上媒體版面與宣傳政績的機會，剛好他在 2018 年也正面對爭奪縣長大位的選舉，因為民調顯示多數彰化縣民支持拆除的決定，魏明谷拆廟對當時膠著的選情（面對國民黨籍的強力挑戰者王惠美），肯定有正面而不是負面的幫助。⁶⁵

讀者可能到此會問，混合三種研究途徑的視野是否一定比傳統的單一路徑分析好？的確統戰、銳實力、認知作戰三類途徑都有其專注的地方，所以它的文獻都只注意某一特定類型的影響力行動，而其他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會被忽略，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也可以立即透過採用混合式分析來解決，但主張混合式分析，並不意味作者否定單一途徑的研究方式，因為必須正視中共對臺工作中，「統戰」同時作為政策論述，以及執行機制的這一個特質：傳統上無論是兩岸宗教交流或是一般的民間交流，都被中共體制清楚歸類於統戰工作的一環，也由統戰系統來規劃與執行相關的決策，因此研究者凡事以統戰來分析兩岸交流的事務，理論上是一個八九不離十的合理決定。

例如中共二十大之後大舉調整對臺人事，新任的國臺辦主任宋濤

65. 回過頭來假設，如果當時縣長不是民進黨籍，而中央決定因為國臺辦在「認知作戰」臺灣的理由，而強力介入這個地方事務，結果會怎麼樣呢？顯然國民黨王惠美仍然還是會在 2018 年打敗民進黨魏明谷當選縣長，但民進黨政府必然會落得「不尊重基層」、「黨同伐異」的罵名。（彰化民調最新出爐！魏明谷 35.4% 王惠美 33.4%），《三立新聞網》，2018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54856>>。

在 2023 年 2 月高調會見了臺灣媽祖聯誼會訪問團鄭銘坤等人，「期勉」臺灣媽祖信眾們要扮演好「促進兩岸心靈契合」的角色；就算在更早兩岸關係良好的時期，2012 年國臺辦副主任葉克冬訪臺，當時也優先會晤臺灣諸多的宗教界人士；2014 年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與 2015 年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訪臺，更把媽祖廟當作試圖影響 2016 年總統大選的「第一站」。⁶⁶ 中共官方都親自定位宗教是統戰臺灣的工具了，因此研究者有非常正當的理由，選用統戰作為分析兩岸民間交流的單一分析工具。

但只把宗教交流以「統戰」視之，尤其是把宗教團體與國臺辦這個形式的互動，當成中共發揮宗教統戰影響力的唯一指標，顯然會產生見樹不見林的問題；嚴格說來，國臺辦只是在對臺工作前線的執行者之一（主要是具有涉外經驗的外交系統人員），不是實際宗教政策的決策者，更說不上是宗教統戰工作的真正執行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系統中的人才是。更精確地說，是統戰部的（原）民宗二局（2018 年之後擴增為第十一局與第十二局）搭了這個「宗教唱戲」的臺子之後，國臺辦的宋濤、葉克冬、張志軍或是劉結一等人，才能在媒體前順勢利用。因此，要真正了解宗教統戰工作的成效，就要深入了解中共治理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的手法與體系，以及臺灣團體在其中的微妙卻別有意義的角色，也需要同時考量這些境外社會團體，可以反過來對於中國內部施加「巧實力」的可能性。⁶⁷

單純視兩岸民間交流為統戰，會忽視了其動員輿論來影響選舉的

66〈國台辦主任宋濤見大甲鎮瀾宮副董 學者：宗教統戰〉，《自由時報》，2023 年 2 月 19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216068>〉。

67 有關臺灣宗教團體對中國影響力的問題，請見張珣，《媽祖·信仰的追尋：張珣自選集》，頁 1-467；黃克先，〈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變〉，頁 367-394；Ray Wang, *Resistance Under Communist China: Religious Protesters, Advocates and Opportunists*, pp. 1-235。

銳實力面向，⁶⁸ 但如果凡事都採用國際學者常用的銳實力觀點來看待所有兩岸民間交流，卻又有以偏概全的問題，因為中共進行對臺影響力工程的做法，就是與其他國家不一樣，例如它會使用媽祖聯誼會這樣的宗教代理人、會對臺「讓利」、會使用「兩岸一家親」這樣的語言，⁶⁹ 這些都不可能在其他國家的銳實力工程中出現。因此對這些工具與手段，用統戰去理解反而會比銳實力更能貼近中共的思維，認清它常常是在「出口轉內銷」的真實目的。⁷⁰ 例如支持統促黨、媽祖聯誼會或是「五星廟」這些小眾的臺灣團體，顯然不是為了「爭取臺灣民心」；而是要在中國民眾面前，塑造臺灣在中共牢牢地掌握之中的形象工程（類似政協中民族宗教團體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才是中南海支持這些團體的真實目的。

肆、結論

從碧雲禪寺到臺灣媽祖聯誼會，從佛教到基督教，兩岸宗教交流的各種案例都在提醒研究者，面對兩岸民間交流的複雜性與多變性，研究視野不能僅限於兩岸交流中正面的部分；其中容易「質變」、被用來進行統戰、銳實力或認知作戰的部分不應該被忽略。造成這個忽略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其手法的隱蔽與資料取得的困難，更是因為傳統學術研究常用的分析工具，受到本身學門界線的切割所致，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整理比較三種不同的文獻，提出一個混合式影響力的分析架構，讓統戰、銳實力與認知作戰三個看似不同層次之工具，能夠放在一起分析複雜多變的兩岸民間交流議題，使得被忽略的問題能夠浮上檯面，受到更多合理的檢視。

⁶⁸ 沈伯洋，〈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頁 1-65。

⁶⁹ 古明君、洪瑩發，〈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頁 289-324。

⁷⁰ 陳宥喬，〈一「媽」各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再檢視〉，頁 1-192。

面對威權政權彈性與多元的威脅，學術研究習慣性地把三種行為分開處理，這一方面是研究者個人專長的侷限，例如研究宗教的學者多是受文史訓練，極少有人熟悉政治分析；而做政治分析的學者又不擅長做宗教田野；擅長網路戰與心理戰研究的專家，更少會去注意到民間交流與宗教交流這一類的事例。另一方面，這是學術領域受限於出版管道偏好「純理論」研究的結果，搜尋一下 TSSCI 與 SSCI 級的期刊中有多少「認知作戰」或「統戰」的文章，就會理解這個問題其實不小。面對中共軟硬兼施的統戰手法、隱蔽的銳實力作為、各式媒體上難以禁止的假訊息操弄，其形式與目標恐怕不僅如銳實力專注的選舉操弄，當然也不僅止於認知作戰所關注的假訊息與假帳號，更不只限於「反獨促統」而已。突破目前文獻的盲點，研究者需要更全面的視野。

本文比較三種研究途徑後最重要的結論，就是研究者需要跨出自己學門領域，去擴大思索兩岸民間交流的多方面影響。作者希望本文提出的「混合式影響力分析」，可以幫助未來研究者去擴大且同時精確化資料搜索與取樣的範圍。研究網路與選舉的人一定很少注意到宗教，反之亦然；他們不一定會有自信去做「混合作戰」的研究，但一定可以從其他類別的文獻中找到需要的證據與補足疏漏的視角。

本文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對此提出完整的解決之道，而是要點出幾個明顯需要補足的盲點，與未來需要的研究方向。第一，可以被標示為中共「影響力」或「滲透」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研究者不應該犯「瞎子摸象」的錯誤，硬把所有可能沾上邊的東西都丟入研究當中，而是要清楚選擇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了解其優缺點，並慎選合乎分析框架限制的案例。

前面的比較與綜合討論顯示，針對中共境外影響力作為的動機問題，答案對於使用統戰與銳實力的研究者而言比較清楚。以贏得國內和海外華人菁英進入「隊伍」的統戰，可以透過已知的統戰外圍組織去蒐集資料，而銳實力要贏得文化與意識形態陣地所使用的「威權工

具箱」，都有明確的執行者，要辨識這些執行者（通常是孔子學院這樣的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較為容易。但對於認知作戰來說，要辨識發動者的企圖就比較困難，除非有明確的外交或軍事目標已經被揭露。因為認知作戰的訊息流行病（infodemic）問題更為嚴重，需要分析的對象並不具體，這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要回應認知作戰的困難度更高，更需要事前的規劃與布置。

銳實力或統戰，可以大致區分為「對外國人」與「對華人」，前者重視國際議題，而後者專注與中國內政或港澳臺相關的互動。但研究者必須小心這兩個區分的粗糙與模糊，尤其銳實力牽涉到的「雙重標準」及美國顏色政治的問題。非常直白地說，使用美國自由主義大師奈伊的理論，也不能忘記他同時也是一個民主黨策士；以銳實力或統戰為關鍵字發表文章，不僅僅是客觀的學術理論選擇問題，也會帶來讀者對於研究者本身不同的主觀評價。輕則被貼上某一個政黨傾向的標籤，重則會被批判為「反華」、「歧視」或「種族主義者」，這是作者在研究中接觸全球研究者後得到的親身經驗。

第二，操作指標的合理性，與選擇哪一種議題來研究會有直接的關係。統戰研究者關注團體間的互動關係，適合有明顯「代理人」或「統戰隊伍」存在的議題，例如牽涉商人、宗教人士與少數民族團體的議題都非常容易找到代理人作為分析的指標，而中共與其統戰對象的對價關係也較為容易解釋，前述討論兩岸宗教交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用研究方法的語言來類比，銳實力與認知作戰的研究者多關注輿論與選舉，要去解釋的「應變數」（dependent variable）非常清楚，但哪些人或團體是合格的「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銳實力關心文化輸出這種由下而上的影響力工程，因此對於宗教、文化、學術等意識形態陣地議題解釋能力較強。也因為執行者與受眾都非常具體，銳實力對於中共影響力分析最具有操作性。而認知作戰的文獻相對來說並沒有統一的想法，對於選擇「誰的」網路聲量或意見，通常根據的都是對選舉是否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宗教人士大概永遠不

會被研究認知作戰者選擇，但宗教人士對於統戰或銳實力的研究者而言，卻會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這樣的取捨問題將永遠是研究者面臨的挑戰。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問題，即對於各式各樣的中共影響力工程，為何仍持續投入成效不佳的人與組織？以對臺宗教統戰來看，似乎對社會影響力微弱且成效不彰，但為何中共仍要繼續投資白狼、魏明仁這類型的「中共代理人」？統戰、銳實力很難提供合理的解答，讓這樣的人加入統戰隊伍或是「威權工具箱」的壞處顯然大於好處。但從認知作戰的角度，也許答案會比較合理：支持統促黨、「五星廟」人士可能是一種類似「假旗」的行動，目的不在贏得臺灣人民普遍的支持，而是要刺激臺灣政府或民眾去過度反應，而這些反應就變得讓中共去批評臺灣（例如用來證明臺灣當局欺壓「中國人」、在搞「去中國化」），甚至讓武力干預臺灣（動武的三個條件），獲得某種程度的合法性。這正是認知作戰研究在俄羅斯介入美國總統大選或俄烏衝突中看到的現象。

如何應對這些威權影響力的挑戰，是這三種類型研究的重中之重，用奈伊的話來問，就是民主國家政府能不能把本身軟實力長處與傳統軍事與外交手段結合在一起？目前文獻中有用的建議仍然有限，但混合式影響力分析可以提出一個具體的方向：歷史上宗教團體一向是民主國家政治的長期參與者與市民社會發展的基石，所以民主社會中享有自由的宗教團體，要被沒有宗教自由的威權政體「成功」統戰的可能性極低，反倒是作為軟實力輸出管道，例如鼓勵它們積極參與兩岸與國際事務，成為臺灣官方外交一環的可行性極高，值得外交決策者考慮。但另外一方面，這些民間宗教團體對於兩岸政治的敏感度不一，尤其中小型團體對於「被」銳實力或是變成認知作戰的工具，可能沒有足夠的理解與能力預防，這也是兩岸關係決策者可以去努力溝通與準備的面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研究俄羅斯後提出有關提高危機意識的早期預警計畫，值得臺灣參考。

面對威權體制在軍事與外交上的威脅，一般的建議不外乎增強軍力的現實主義策略，或努力增加盟友合作的自由主義途徑。但面對統戰、銳實力、認知作戰這些牽涉文化、藝術、音樂、電影、宗教或學術等「軟」議題上的威權挑戰，前面兩種回應可能不是這麼有直接的幫助。

也許答案必須要跳出現有的框架。文化傳播學者黃俊銘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⁷¹中共對內的文化政策也許非常僵化，但對外有一個利用「由下而上」推動境外影響力的清楚大戰略，但臺灣從來沒有相應的戰略。無論是海洋絲路國家上的「宗教外交」、⁷²音樂推廣上的「正能量嘻哈」，⁷³或是國際大外宣中的「說好中國故事」，⁷⁴無論名稱叫什麼，對於中共「文化走出去」的這種戰略，臺灣都缺乏能夠回應的文化交流論述，而臺灣明明在音樂、文化及宗教等方面對中國甚至全球華文世界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臺灣的人才與文化競爭力卻不斷在中國這些戰略的磁吸效應下流失。臺灣歷年政府，無論藍綠，都對這些文化議題缺乏興趣，而發展像巧實力或認知作戰這種由上而下的反制戰略，對於應付這些由下而上的挑戰是否足夠，也值得商榷，這也是研究這些主題時，有識之士都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收件：2022年7月21日

修正：2023年3月28日

採用：2023年4月12日

71.黃俊銘，〈台灣流行音樂在中國：朝向一個中國—台灣的中介社會學〉，《傳播文化與政治》，第13期，2021年6月，頁1-33。

72.古明君，〈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頁103-132。

73.戴瑜慧，〈從中國有嘻哈到中國新說唱：軟實力政策、網路市場與嘻哈次文化的共生〉，《中國大陸研究》，第62卷第3期，2019年9月，頁25-61。

74.姚遙，《新中國對外宣傳史：建構現代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477。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1。《鄧小平論統一戰線》。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
- 姚 遙，2014。《新中國對外宣傳史：建構現代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張 珣，2003。《文化媽祖：台灣媽祖信仰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 珣，2008。《媽祖·信仰的追尋：張珣自選集》。臺北：博揚文化事業。
- 張瑞忠、劉雪梅，2004。《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 300 問》。北京：軍事科學院出版社。
- 喬 良、王湘穗，1999。《超限戰：兩個空軍大校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程寶山主編，2004。《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基本問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專書論文

- 古明君、洪瑩發，2017。〈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左岸文化，頁 289-324。
- 黃克先，2017。〈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變〉，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左岸文化，頁 367-394。

劉怡寧，2017。〈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左岸文化，頁 325-366。

期刊論文

Gerry Groot、林鈺鈴，2019/12。〈自我毀滅的秘密武器？統合主義對統一戰線的制度性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4 期，頁 1-24。

王宏仁，2019/9。〈「銳實力」概念於「後」中國崛起時期之理論化探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3 期，頁 1-23。

古明君，2019/12。〈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4 期，頁 103-132。

沈伯洋，2021/1。〈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2 卷第 1 期，頁 1-65。

周英，2017/6。〈孔子學院的海外危機及其原因探析〉，《東亞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頁 39-66。

施正鋒，2015/6。〈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頁 21-50。

陳津萍、徐名敬，2021/6。〈中共「心理戰」與「認知域作戰」發展之比較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118 期，頁 119-148。

張家麟，2009/9。〈中共軟實力分析及我應用對策—從宗教軟實力論述〉，《中共研究》，第 43 卷第 5 期，頁 114-117。

郭雪真、洪陸訓，2007/6。〈中共心理戰的研發與戰備〉，《復興崗學報》，第 89 期，頁 1-29。

郭瑞華，2019/4。〈地方包圍中央：中共對臺新策略與挑戰〉，《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17 卷第 4 期，頁 143-159。

曾柏元，2021/4。〈俄羅斯運用社群媒體進行資訊戰之分析—以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為例〉，《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7 卷第

576 期，頁 43-68。

游智偉、張登及，2011/10。〈中國的非洲政策：軟實力與朝貢體系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頁 111-156。

黃俊銘，2021/6。〈台灣流行音樂在中國：朝向一個中國—台灣的中介社會學〉，《傳播文化與政治》，第 13 期，頁 1-33。

黃寶瑛，2009/10。〈兩岸政教關係中的宗教交流：以慈濟模式為例 (1991-2008)〉，《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 8 期，頁 73-110。

黑快明，2020/7。〈中國銳實力對澳洲的滲透與澳洲政府的回應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1 卷第 3 期，頁 41-109。

楊開煌，2001/4。〈中共「統戰會議」之分析—兼論兩岸學界對統戰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 卷第 2 期，頁 97-133。

廖 箴，2012/12。〈兩岸海外漢學推廣的競與合：以「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為例〉，《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頁 113-138。

劉泰廷，2016/1。〈孔子學院和中國對東南亞巧實力戰略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3 第 1 期，頁 97-108。

蕭新煌、楊昊，2014/7。〈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中的角色〉，《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5 卷第 3 期，頁 1-56。

戴瑜慧，2019/9。〈從中國有嘻哈到中國新說唱：軟實力政策、網路市場與嘻哈次文化的共生〉，《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3 期，頁 25-61。

學位論文

陳宥喬，2021。《一「媽」各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再檢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討會論文

張貴閔，2019/12/12-13。〈宗教超然或宗教促統？跨海峽道教信仰

互動的多重場域和行動邏輯〉，「解構銳實力：中國因素 2.0」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頁 44-46。

網際網路

- 2010/11/11。〈搶廟產失利 碧雲禪寺住持控建商詐騙〉，《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442837>>。
- 2017/1/2。〈彰化升五星旗吸百餘人參加 縣長怒斥：認賊作父〉，《三立新聞網》，<<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12523>>。
- 2018/2/19。〈涉嫌干涉美國大選的「俄國五毛」戰術非凡〉，《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120555>>。
- 2018/3/2。〈王國慶：所謂的銳實力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本〉，《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2/c_137011380.htm>。
- 2018/9/20。〈「佔廟為匪宣傳」躍「紐時」民代批評彰縣府丟臉丟到國際〉，《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7653>>。
- 2018/9/26。〈彰化碧雲禪寺被拆等案 中國反應強弱有別〉，《今日新聞》，<<https://www.nownews.com/news/2983705>>。
- 2018/11/11。〈彰化民調最新出爐！魏明谷 35.4% 王惠美 33.4%〉，《三立新聞網》，<<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54856>>。
- 2019/12/29。〈反滲透法對撞民意！反對聲浪從藍橘白蔓延到深綠獨派〉，《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229000472-260118?chdtv>>。
- 2020/1/2。〈怕查水表 金門老街五星旗連夜拔除〉，《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102000452->

260118?chdtv>。

2020/4/29。〈林榮基台灣重開銅鑼灣書店遭遇的坎坷〉，《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460639>>。

2020/7/6。〈孔子學院：防範與爭議中改頭換面的中國文化機構〉，《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308869>>。

2020/12/15。〈葉小文：當前我國的宗教問題—關於宗教五性的再探討〉，《人人焦點》，<<https://ppfocus.com/0/he5e0f3b9.html>>。

2023/2/19。〈國台辦主任宋濤見大甲鎮瀾宮副董 學者：宗教統戰〉，《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21606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5/7。〈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

田 姝，2019/4/11。〈鄧小平與「一國兩制」的構想和實踐〉，《鄧小平紀念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411/c69113-31025215.html>>。

田宇辰，2020/7/10。〈孔子學院和李子柒，文化輸出到底該 Pick 誰？〉，《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58628529>>。

林俊宏、黃揚明，2019/10/27。〈白狼自稱中共同路人 統促黨滲透 30 宮廟爆染紅危機〉，《鏡媒體》，<<https://www.mirrormedia.com/story/20191022inv010/>>。

周恩來，1945/4/30。〈論統一戰線〉，《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zhouenlai/219.htm>>。

公孫策，1999/4。〈媽祖直航〉，《商業周刊》，第 593 期，頁 14-21。《商業周刊》，<<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7551>>。

劉曉琰，2022/3/29。〈反華組織 NED 將於 10 月在臺北辦「民主大會」，外交部揭批該組織罪行〉，《環球網》，<<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OCp6lyzWv>>。

英文部分

專書

- Abramowitz, Alan, 2018. *The Great Alignment: Race,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rdenal, Juan Pablo et al., 2017.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Diamond L., Marc F. Plattner, & Christopher Walker, 2016.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Keir, 2016. *Handbook of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Roma: NATO Defense College.
- Groot, Gerry, 2004. *Managing Transi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and Hegemon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Kuo, Cheng Tian, 2009.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New York: SUNY Press.
- Libicki, Martin C., 1995. *What is Information Warfa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Madsen, Richard, 2007.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ssa, Paolo, 2019. *The Age of Sharp Power: China, Russia and Iran: The Interference Is Not Soft. The Italian Case*. Milano: Bocconi

University Press.

Peter, Laurence J. & Raymond Hull, 1969. *The Peter Principle: Why Things Always Go Wrong*.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Wang, Ray, 2019. *Resistance Under Communist China: Religious Protesters, Advocates and Opportunis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專書論文

Jaitner, Margarita, 2015.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Lessons from Ukraine,” in Kenneth Geers, ed., *Cyber War in Perspective: Russian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Tallinn: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 (CCDCOE) Publications, pp. 87-94.

期刊論文

Leonova, Olga G., 2019/2. “Sharp Power – the New Technology of Influence in a Global World,”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3, No. 2, pp. 21-28.

Nye, Joseph Samuel Jr., 2009/7-8. “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4, pp. 160-163.

Nye, Joseph Samuel Jr., 2021/2.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14, No. 1, pp. 196-208.

Vosoughi, Soroush, Deb Roy, & Sinan Aral, 2018/3.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Vol. 359, Issue 6380, pp. 1146-1151.

Wang, Ray & Gerry Groot, 2018/8.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pp. 569-583.

Walker, Christopher, 2018/7.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 pp. 9-23.

網際網路

2014/9/13. "Confucius Says,"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4/09/13/confucius-says>>.

Abramowitz, Alan, 2019/8/8. "Did Russian Interference Affect the 2016 Election Results?" *Sabato's Crystal Ball*, <<https://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did-russian-interference-affect-the-2016-election-results/>>.

Adelman, Ken, 2011/4/18. "Not-So-Smart Power: Go Ahead, Congress, Cut Away at U.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4/18/not-so-smart-power/>>.

Armitage, Richard L. & Joseph Samuel Nye Jr., 2007.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CSIS*,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sissmartpowerreport.pdf>>.

Foxall, Andrew & John Hemmings, 2019/12/19. "The Art of Deceit: How China and Russia Use Sharp Power to Subvert the West," *Henry Jackson Society*, <<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publications/the-art-of-deceit-how-china-and-russia-use-sharp-power-to-subvert-the-wes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021/5/20.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NATO Review*,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l>>.

- Kim, Taehwan, 2018/6/18. “Authoritarian Sharp Power: Comparing China and Russia,” *The ASAN Forum*, <<https://theasanforum.org/authoritarian-sharp-power-comparing-china-and-russia/>>.
- Nye, Joseph Samuel Jr., 2018/1/24.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cid=nlc-fa_fatoday-20180124>.
- Qin, Amy, 2018/9/19. “Buddhist Temple, Now a Communist Shrine, Plants China’s Flag in Taiwa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9/world/asia/taiwan-china-reunification-buddhism.html>>.
- Walker, Christopher & Jessica Ludwig, 2017/11/16.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 Walker, Christopher & Jessica Ludwig, 2021/5/12. “The Long Arm of the Strongman: How China and Russia Use Sharp Power to Threaten Dem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long-arm-strongman>>.

Soft Power, Sharp Power or Cognitive Warfare? A Hybrid Influence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Chinese Religious United Front in Taiwan

Ray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Civil society exchanges are growing rapidly and are the most stable dimens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y currently play a role in sustaining an uneasy peace across the Strait, but China is alarmed by the possibl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Taiwan is troubled by the “united front” problem that comes with these types of relations. Among all, religious exchanges have caused the most heated debate in Taiwanese society. While supporters believe they represent the benefits of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soft power of Taiwanese society to influence China, critics argue that these activities are embedded with Chinese “united front,” “sharp power” or “cognitive warfare” operations, because som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play the role of “Chinese agents” t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elections, or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aiwa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finitions, measurements, and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from three groups cover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uses the knowledge to reexamine the current findings of cross-Strait religious exchanges. The author proposes a new “hybrid influence analysis” to address the overlooked fact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often mix and combine these tools in their influence operations. This new approach could generate more compreh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more thoughtful public conversations and hopefull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olicy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United Front, Sharp Power, Cognitive Warfare, Cross-Strait Relations, Cross-Strait Religious Exchanges

